

华夏使者三部曲

唐灏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毛泽东

中苏结盟之行



- 中苏结盟
- 一波三折
- 挫败谋杀
- 巧破僵局
- 史料翔实
- 内情揭秘
- 悬念迭起
- 细节丰富

.....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012Z0317428



毛泽东 中苏结盟 之行

唐灏 著



SBT38/13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中苏结盟之行/唐灏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5. 5

ISBN 7-5008-3510-8

I. 毛… II. 唐… III. 毛泽东 (1893~1976) 一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6710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379038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 数: 234 千字

印 张: 14.125

印 数: 1-8068 册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毛泽东中苏结盟之行目录

● 第一章 第一使命	1
● 第二章 顶级谋杀	27
● 第三章 “蜜月”风波	39
● 第四章 巧破僵局	83
● 第五章 拒开先例	113
● 第六章 虎口夺食	147
● 第七章 机关算尽	183
● 第八章 新的篇章	197



华夏使者三部曲
毛泽东 中苏结盟之行

第一章 第一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1

公元1949年10月1日,是20世纪一个伟大的日子。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万众云集,红旗飘扬。

将近下午3时,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周恩来、刘少奇、张澜、林伯渠、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人,依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主席台前就位。

身材魁梧、面容慈祥的毛泽东身穿特意为他缝制的“礼服”——一套美国黄色将校呢制服,显得神采奕奕,他面对广场上翘首仰望、凝神注视的数十万群众,热情地摘下帽子,露出宽阔的前额和长长的黑发,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招手。

顿时,天安门上下掌声雷动,如暴风骤雨一般,经久不息。数十万双眼睛一齐望着天安门城楼,身着节日盛装的群众,像盛开的花朵,铺满了整个天安门广场,在阳光的辉映下,分外妖娆。

广场上的红旗在蓝天的衬托下,像彩霞一般随风飘动,人们兴奋欣喜的面孔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3时整,林伯渠看了看手表,低声对身边的周恩来打了个招呼,然后便宣布开会。这时,毛泽东手持讲话稿,面对麦克风,用他那乡音浓厚的湖南话,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一庄严洪亮的声音惊天动地,响彻环宇。顿时,万众欢腾,山呼海啸。

此刻,毛泽东将要亲手按动面前的升旗电钮。他用那双扭转乾坤的大手,伸出一个指头,稳稳地按在乳白色的电钮上,久久没有松开。

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向天空,迎风招展。

54门礼炮齐鸣28响,每一响都惊天动地。这28响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先烈们前仆后继、奋斗牺牲的28个年头。

天安门广场上空，同时响彻了激越高昂的国歌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升旗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事业正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召开，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最后，毛泽东说：

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是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个春秋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领导中国人民终于筑成了新的钢铁长城。第一次以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但纵观全球，欧风美雨，仍咄咄逼人。动荡复杂的世界，是否会承认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呢？



想到这点，毛泽东此刻并不十分乐观。

其实，毛泽东的担心并非不无道理，因为他深知中国人民所从事的事业，是开天辟地的革命伟业。它不仅彻底推翻了千百年来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扫除近百年来民族屈辱、陈规陋习，而且还打破了旧的世界格局，也惹恼了帝国主义列强。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那些多年来一直想鲸吞蚕食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们不但不会承认它，而且还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它、推翻它。那些深受侵略和压迫的弱小国家，对中国虽抱同情，有心支持，却无能为力。加之苏联的斯大林对自己又一直持怀疑态度……

所以，毛泽东曾担心地说过，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没有反应，不予承认，那就有问题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外交上面临的首要紧迫任务，便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告知世界各国政府，争取各国、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承认。

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在提出外交上“另起炉灶”的方针时，即已明确指出：

1. 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

2. 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这一方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得到了确认和体现。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的《公告》通知各国政府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不易处理的问题。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采取的第一个外交行动，由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直接领导，亲自部署。

这时，原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解放还不足半年，国民党政权机构南迁广州，中国国内战事也尚未结束。除苏联大使迁往广州外，一些国家驻华外交机构先后撤离中国，但也有不少国家，包括一些大国的外交机构和外交代表尚未撤走，留驻原地保持“立足点”或进行观望。

这些外交机构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三地。

中央决定以周恩来外长公函形式快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送交各国当时的驻华外交代表。公函中，首先告知这些驻华外交代表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宣告成立，并明确指出：“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这封公函对收件人一律不称官衔而称为“先生”，这既表明新中国、新政

府的成立，公函具有权威性，又避免造成承认旧中国外交关系的误解，是一份很特殊的外交文件。

对文件的发送，周恩来亲自作了周密部署：

在北京，由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于10月1日下午派干部送交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多米尼亚八个国家设在北平的旧总领事或领事，他们收下公函（其中多米尼亚领事离去，由秘书代收），签了回执，进展顺利。

对于在南京、上海两地如何进行，周恩来分别于10月1日、2日连发两次指示。

10月1日致电南京市委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除电告《公告》全文外，并嘱“校正无误后以最好的硬纸”印出，做好准备，俟签字公函自北京送到后，即附入公函，送达各国使馆。接着又于2日晨致电南京市委转黄华并告上海市委，转达外侨事务处处长章汉夫，告知北京送交公函、公告情况。要黄华接电当日约见在南京的14国旧大使、公使，作如下口头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已于昨日将公函并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分送给在北京的苏、美、英、法等八国旧领事，凡是旧领事在北京者，则于今日派人将文件送来南京转达诸位。在正式公函来到前，本人奉命将此事转告诸位。文件内容即为昨日新华社发表的政府公告和外交部部长公函。

周恩来还指示：今日的口头通知，必须向他们声明请其转达自己的政府。如彼等拒绝转达，则需将其口头声明记下。在送文件时，需取回收条或拒绝接受的书面回文。

由于当时各国外交机构和外交代表驻地时有变迁，行踪不定，周恩来又作了交代：以上各事，凡南京有使馆代办者，上海不再作同样转达，故必须黄华将上述手续进行完毕以后，再告章汉夫，究竟有哪几国人员还在上海需要章汉夫处理。

周恩来还估计到各国留守官员可能提出向各自政府发电报的问题。为此，他指示：如果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可许其经过国际电台向本国拍发密码电报。

周恩来第二个指示要南京先向各国外交代表作口头通知后送文件，可能是为了表示我国对此项行动的重视，使各国尽早知道中国之态度；他对谈话口径和可能遇到的情况如何处理，都作了具体交代，有若指挥军事战役，周到细致，万无一失。

南京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根据周恩来指示于10月1日晚约见在南京的旧大



使、公使或代办，因2日是星期日且有群众游行，会见延至3日晨在外侨事务处进行。

出席的有11国外交代表，分别为：印度、缅甸、暹罗（泰国）、埃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六国大使；奥地利、葡萄牙两国公使；波兰、阿富汗、土耳其三国代办，黄华按指示作了口头通知。公函及《公告》10月7日送达各使馆。

捷克斯洛伐克在南京只有一名职员留守，无外交官，黄华请示后补送。

瑞士留守人员不在南京，也是后来补送的。

南京于10月7日完成送交公函、《公告》任务后，上海于当日采取行动。

上海因于1949年5月27日解放，迟于南京一个多月，有些大使馆、公使馆自宁迁沪，加上原有的20多个国家的总领馆、领事馆，曾有31个国家的外交机构。但上海解放前后，多数驻我机构已撤离回国。

10月7日前尚在上海的有：瑞典大使、丹麦公使、墨西哥代办、菲律宾总领事、挪威使馆秘书。

上海外侨事务处于10月7日将公函附《公告》送达上述各馆。

巴西大使馆留守人员表示系私人代表，无法将文件转达巴西政府，故未收下。

希腊大使馆迁沪，巴拉圭、芬兰、委内瑞拉领事馆仍有留守人员，但因翻译情况较迟，周外长签字的公函10月底才送到上海，补送时芬兰、委内瑞拉领事馆已撤离，致芬兰函由瑞典代办收转。

这样，就在新中国政府成立后的短短时间内，先后共向30多个国家送交了公函、《公告》。

各国复函中除缅甸、埃及、澳大利亚三国外，都回避称周恩来为外交部长，英国、印度、荷兰、比利时等国称“周恩来将军阁下”、“周恩来将军”或“周将军恩来”；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等国则称“周恩来先生”或“先生阁下”。所有复函均为个人签名，无官衔。

印度、澳大利亚、葡萄牙在复函中表示他们政府正在“考虑”、“研究”中国的公函和《公告》，在此期间，希望由使馆或领事馆同“贵国政府”或“中国的适当当局”保持非正式的联系。

加拿大代办奉命访黄华，表示希中国政府能按国际惯例通常对待领事的办法，准许加拿大在华领事行使正常职权。

然而，让毛泽东感到欣喜的是：仅仅过了十多个小时，就从苏联首都莫斯科拍来了世界上第一封致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贺电：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10月1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受苏联政府之委托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安得列·葛罗米柯

1949年10月2日于莫斯科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并兼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的师哲，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份热情的贺电译了出来，并亲自送给了周恩来和毛泽东。

苏联政府的反应之快，使全世界都始料不及。许多国家领导人，这时还在瞪大眼睛看着新中国有没有人理睬呢！

由于苏联的首先承认，紧接着蒙古、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和东德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以最快的速度拍来贺电，纷纷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

面对着这些贺电，毛泽东如释重负，不由得高兴地笑了。

入夜，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载歌载舞，中南海内，灯火辉煌。

毛泽东从北京饭店参加开国盛宴后，又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了欢庆开国大典的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的焰火，当他回到在丰泽园的住处菊香书屋，已经是深夜11时许了。

尽管忙碌了一天，毛泽东此刻仍然精神饱满，毫无倦意。面对着斯大林从莫斯科拍来的贺电，毛泽东不禁浮想联翩，他点燃一枝中华牌香烟，独自在室内书柜前思索良久。然后顺手取出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打开封面，便看到斯大林的半身照片，不由端详起来。斯大林的形象，是那么庄严而深沉，嘴边的胡子好像掩盖着无数的秘密。那淡淡的笑容，似乎又表示出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虽然从未见过斯大林本人，只是在书本上、电文中和别人的传言之中，听到过关于斯大林的信息。而此刻，在新中国正式诞生需得到国际承认的关头，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首先伸出了友谊之手、同志之手，使毛泽东备感温暖，备感亲切，同时也备受鼓舞，大大地增加了他的自



豪感和自信力。

毛泽东十分清楚地记得，早在三个月之前，就在决定新中国前途、命运的时刻，1949年6月30日，他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为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方针作出过明确的判断：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和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这就是建国后一度成为新中国外交路线总方针的“一边倒”政策。

因为毛泽东知道，要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件不容易的事，也是他和中国共产党人从未经历过的大事，建设需要友谊的援助，要学前人的经验。而这方面，苏联的经验是可资借鉴的。因此，他认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想到这里，毛泽东立刻拿起桌上的红色专线电话耳机，分别打电话将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请到自己的住处来，共同商谈他着手准备出访苏联、亲自会晤斯大林的问题。

2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中，共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五位书记。而在这五人之中，惟独毛泽东是从未出过国门，其他四位都先后有过“留洋”的经历。

刘少奇于1921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又去莫斯科出席过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还曾一度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周恩来更是早在1917年便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后又于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

朱德于1922年去德国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于1925年转赴苏联学习。

任弼时也于1921年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并于1938年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所以，毛泽东常常自嘲地说自己是既没有喝过洋墨水，也没有啃过洋

面包的“土包子。”

其实，毛泽东早在30多年前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曾经萌发过去苏联的念头。

那时候，中国的革命者都纷纷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也主张去国外学习，但不是去法国，而是去苏联勤工俭学，预备组织一支留俄队。然而，他的愿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

但毛泽东始终坚信自己的道路和选择，他认为自己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自信中国革命的道路要靠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去完成。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主要即同斯大林）的联系一直是十分密切的，当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同斯大林商讨。

早在1947年初，毛泽东就曾经要求访问苏联和东欧、东南欧等一系列国家，但是都被斯大林一次次婉言推托了。

毛泽东首次提出访问苏联是1947年初，正值我国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是实现总体战略部署关键的一年。解放战争中，中苏两党的合作关系决定着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走向。双方互助互利的合作关系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对此，双方不仅负有义务，而且负有责任。

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不仅要考虑战争进程，即战略战术问题，而且肯定看得更远，看到解放战争后新中国建国、治国方针的大事。毛泽东的意愿传达过去之后，直到6月15日，通过苏方电讯联络员奥尔洛夫，才得到答复：斯大林同意毛前来，但有一个条件：访问绝对保密，不可走漏丝毫风声。

然而，过了两个星期，即7月1日，斯大林又向奥尔洛夫拍发了一份内容迥异的电报：

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产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以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

列多夫斯基解释说，斯大林之所以不同意毛泽东访苏，真实原因是苏、美、英、法因为德国问题和苏联援助中共，使国际局势变得急剧紧张复杂。其实，还有一个不便说明的更深一层原因，那就是斯大林错误地理解了中国的战局。

当时是中共故意放弃延安，布下“口袋”准备更有力地打击蒋军，毛泽东对此胸有成竹，但斯大林却内心紧张，以“会对战事产生不良影响”为由，婉拒毛



泽东的访问，因为他对中共能否胜出毫无信心，担心毛泽东的访问使苏联在西方列强面前“惹火烧身”（当时正是苏联与西方冷战全面展开的时刻）。

1948年4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部分同志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时，他就打算亲自访问苏联，与斯大林面谈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一些大政方针，并组织了一个精干的代表团，准备乘坐吉普车开往中苏边境。

当电询斯大林的意见时，斯大林复电的大意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目前正处于决定性的关头，作为统帅的毛泽东，不宜离开其岗位，再加上路程遥远，交通不便，还有国民党的封锁线，行动不安全。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他将派一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中国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望毛泽东再三考虑。

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这一建议。

其实，斯大林建议的真实背景是，1948年上半年苏联开始封锁德国柏林通道，以“莫洛托夫计划”对抗马歇尔计划，苏联制造捷克二月政变，苏南关系开始紧张，苏联对东欧各国主张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人酝酿新一轮镇压，国内粮食危机严重。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到了平山县的西柏坡，当时，由于战局动荡，苏方也不宜来人，一直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歼灭了保定之敌后，斯大林才派米高扬秘密来华。1月的最后一天，正当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之日，米高扬抵达了西柏坡。

米高扬和苏联铁道部副部长、负责恢复中长铁路的柯瓦廖夫等人一起在西柏坡待了一个星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进行了会谈。其内容主要是由毛泽东向米高扬详细地说明当时我国国内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步骤，以及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形式，经济建设和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问题。

米高扬说他只带了耳朵来，主要任务就是听，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回去即向斯大林汇报。

不多一会儿，刘少奇、周恩来、汪东兴等人应召来到了丰泽园内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

“恩来同志——”毛泽东对首先赶来的周恩来说，“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

“是啊！”英俊潇洒的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轻轻地点了点头道，“今年正逢斯大林同志70寿辰的生日，苏联准备庆贺，记得他那年

60岁寿辰的时候，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一篇祝贺的文章吗？”

“不错！”刘少奇微笑着接过毛泽东递过来的香烟，想了想道，“那篇文章的标题名叫《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对吧？”

“是啊！”毛泽东提及此事，不无感慨地说，“那时我们还窝在山沟里。一晃就是十年，真是弹指一挥间呀！”

周恩来说：“今年12月21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同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刘少奇道：“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我上次在苏联访问的时候，已经正式告知他们，主席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访问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

刘少奇那次去苏联访问是秘密进行的。

1949年5月，在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解放了南京、上海等众多大中城市，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前夕，为了取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通过苏联争取国际间对中国革命在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和声援，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

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并代表毛泽东前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会谈，磋商和决定一些重大问题，并为毛泽东的这次访问苏联作准备。

“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喔！”毛泽东笑着吸了一口香烟，然后又将其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之间，再用拇指固定着。从口角逸散出来的丝丝烟缕，在他眼前飘绕着。“有关中苏双方的会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情，还得靠你这位政务院总理了。”

“主席，您可以先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好好休息，恢复恢复！”周恩来知道这几个月来，毛泽东因为忙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一些众多事宜而过于劳累，体力有所不支，需要静心休息一段时间。于是便对毛泽东道：“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那我们就打点行装，准备出洋！”毛泽东点了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叮咛周恩来立即着手组织人员作访苏的准备工作，并要求和苏联方面及时取得联系。

毛泽东当下决定由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随他出访，具体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为此，毛泽东还特地指示汪东兴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做宣传。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商量着办。”



聂荣臻当时为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滕代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任铁道部部长，李克农和罗瑞卿身份比较特殊，都是“双跨干部”：李克农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长和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罗瑞卿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汪东兴和他们几个人研究后决定，为确保毛泽东此次出访的安全，除派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所有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外，并由汪东兴负责组织毛泽东的专列和身边的保卫工作。

客人们走后，毛泽东还是彻夜难眠，他又点燃起一枝香烟来一边吸着、一边凝望着中南海天空中高挂的一弯明月，陷入了沉思之中……

新中国的成立，打破了旧的世界格局，使占全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破天荒地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奴役，这就使得帝国主义者气急败坏，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内外串通，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要孤立新中国，封锁新中国，不择手段地要把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搞垮。

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不但决定自己出访苏联，亲自与斯大林会晤，而且还决定王稼祥提前赴苏，出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同时又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接洽两党事务。这样一来，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联系渠道则完全打通，可以不失时机地开展打破帝国主义孤立、封锁新中国的严重斗争。

神秘的电波，将毛泽东的意思传往遥远的苏联首都——莫斯科。

3

10月的苏联已进入冬季，莫斯科阴霾的天空中不时飘舞着雪花。伊万大帝钟楼上的钟声敲响了全城又一个黎明。

生性多疑的斯大林，此刻站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的落地窗前，面对着毛泽东拍来的热情友好的电文，禁不住感到内心愧疚，甚至有点儿左右为难。他转身轻轻地把电文放到桌面上，然后取出他那特制的大烟斗，装上烟丝，点火抽了起来。一团团的白烟，顿时从斯大林的嘴里喷出来，在室内袅袅上升，变化出各种形态。

斯大林凝神地望着那变化无穷的烟雾，渐渐地陷入了对往事的深思。

自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便一直处于一种极其微妙而又颇为复杂的状态，一方面苏联政府和中国的国民政府长期保持着正常的外

往来，另一方面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又甚为密切，支持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国内革命运动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一个两国三方式的特殊关系。如果再加上和一度总部曾设在莫斯科同时亦受斯大林等人领导的共产国际（1943年解散）的关系，那就更是复杂的多边关系了。

经过和中国长期的交往，令斯大林越来越感到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简直是个神秘莫测、变化无常的奇特世界！中国革命，又像头勇猛豪强、力大无比的雄狮，令人难以驾驭！为了中国革命，他也曾不惜殚精竭虑，日夜操劳，花费过许多心血。然而，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的了解，结果往往事倍功半，收效甚微。有几次甚至是事与愿违，妨碍了中国革命的进展。

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当时斯大林一直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因为蒋介石不仅掌握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命脉，还有美国的全力支持。斯大林清楚地记得，就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初期，他还看不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他曾对美国代表霍普金斯说过，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与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

1945年，苏联和蒋介石政权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前的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就曾向美国总统作出过保证，他将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苏联需要拉拢南京政权以制约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华势力的需要，斯大林一直保持着与蒋介石政权的正式外交关系。1945年蒋介石曾派宋子文访问苏联，并与之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是这个条约使《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的条款得以公开化、合法化。

但斯大林也十分清楚，即使让蒋介石掌握了中国政权，中国也不能算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中的一员，因为蒋介石亲西方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从那时起斯大林一直在谋求让中国共产党也能参加到蒋介石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中去。

后来，当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挥起屠刀大举进攻解放区，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奋起抵抗的时候，十分自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为人还了解得太不充分，便打电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这样的建议：

……你党应该维持国内和平，再不能打内战了，否则有把中华民族引向毁灭的危险。